

代理孕母合法化之法律：
以臺灣 113 年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與外國法制比較

2025 年 9 月

申請人：銘傳大學法律學系徐子晴

銘傳大學法律學系

MING CHU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AW

目 錄

習法概述心得

壹、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2
貳、研究目的.....	3
一、從經濟、社會方面剖析，探討現今社會為何有代理孕母的需求？.....	3
二、比較外國現行代理孕母法律制度與我國修法草案之內容差異與制度設計，從中分析並提出我國修法草案之修改建議。.....	5
參、研究方法.....	14
肆、問題討論與結論.....	15
伍、參考文獻.....	16

壹、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近年來全球各地，特別是歐美與亞洲部分國家，積極倡議女性權益，進而促使女權意識在政策與社會文化層面皆有顯著進展。許多新時代女性會為了拚出一番事業，選擇先投入深耕其所擅長的領域，而非年紀尚輕便步入婚姻切換為母親角色。因此，女性晚婚晚孕之現象逐年增多，甚至不婚比例也逐漸提升，等到其遇見適婚男性時，年紀往往已經逼近高齡產婦，而且卵子健康度降低對胎兒健康影響有絕對正向關係，此種情形受孕難度提升。然而單身未婚女性卻無法在台灣合法透過人工生殖技術在適孕年齡時孕育子女，若求助國外生殖機構又需負擔高昂費用，此種窘境可能剝奪女性欲為人母之心切。

身為一名生在 Z 世代的法律系學生，聽聞玫瑰少年葉永鋕事件，迫切感受到身為人能夠自由選擇自己喜好的性向有多重要。成長過程中發現身邊朋友漸漸覺察自身性向及對愛情之喜好，令我讚嘆世界之豐富多元。在 2019 年見證臺灣推出釋字 748 號，讓我國成為亞洲第一國開放同性婚姻，對民主自由、多元開放及共榮的社會備感驕傲。直至大學階段接觸此議題，深刻地了解到儘管目前台灣人工生殖技術成熟，其爭議點為適用對象僅是異性不孕夫妻，使同性婚姻法案貌似空殼。雖然創造了同性婚姻關係，惟對於同性婚姻的家庭功能法制尚無完善保障，考量到平等原則是否應開放同婚伴侶使用人工生殖技術及代理孕母措施？因此，以上提及希望修法擴增適用代理孕母之相關規定，會在本篇研究中詳細地探討適用理由、擴大適用對象之好處及應如何應對施行上之困難。本計畫將以基礎理論探討、當前各國法治實例以及數據分析進行研究。

貳、研究目的

1. 從經濟、社會方面剖析，探討現今社會為何有代理孕母的需求？
2. 比較外國現行代理孕母法律制度與我國修法草案之內容差異與制度設計，從中分析並提出我國修法草案之修改建議。

一、從經濟、社會方面剖析，探討現今社會為何有代理孕母的需求？

(一) 社會面：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台灣女性不婚、晚婚及晚孕現象日益顯著¹，1. 女性有偶率下降：截至 2022 年，女性有偶率降至 48.37%，創下歷史新低。2. 適婚年齡女性結婚比例降低：在 25 至 29 歲年齡層，女性結婚比例僅為 17.72%；在 30 至 34 歲年齡層，女性結婚比例降至 41.41%。3. 初婚年齡延後：2022 年，女性初婚平均年齡達 30.1 歲，較前一年增加 0.2 歲；同年，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為 30.7 歲，亦創歷史新高。內政部官員指出，從歷年來粗結婚率變化來看，去年底已掉到千分之五·三六，僅次於 2009 全球金融海嘯時的千分之五·〇七與 2020、2021 年疫情爆發時的千分之五·一六、千分之四·八八，顯示不婚現象日益增加，如果碰上經濟「黑天鵝」時，更讓適婚男女對婚姻卻步。這些數據顯示，台灣女性傾向於推遲結婚，甚至選擇不婚，這一趨勢可能對國家的人口結構和生育率產生深遠影響。

台灣社會近幾年出現少子化、高齡化現象一段時間，這些現象將引發後續一連串問題，本文列出以下五點來討論：1. 勞動力減少與經濟成長放緩，由於少子化與高齡化導致青壯年勞動力供給減少，造成勞動人口佔比結構性下降，降低了整體生產力、創新能力，同時扶養比提高、國內消費能力受限，進而削弱國家整體生產力與經濟成長動能。2. 社會福利與醫療支出增加，高齡人口數量快速增長，直接推升了養老金、長期照護和醫療資源的需求；同時，青壯年納稅人口減少，縮小了社會保險的繳費基礎，導致社會保險體系的收支平衡壓力急劇增加。3. 家庭結構變遷與照護壓力，出生人數下降導致核心家庭規模縮小，同時平均壽命

¹ 自由時報，晚婚！不婚！女性有偶率 僅剩 48.37%，<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633656>，(最後瀏覽日:2025/09/30)

延長擴大了長照需求，使青壯年世代陷入同時需照顧幼兒與年邁父母的「三明治困境」，大幅提高了家庭照護的強度與成本壓力。

4. 教育與養育成本上升，高齡化導致社會資源主要投入於長者照護，減少了政府對兒童公共養育設施的投資。

5. 社會活力與創新能力下降，高齡化造成社會人口結構趨於老化與保守，可能降低社會對風險的承受度與對變革的接受意願；少子化減緩了知識、技術與文化經驗的世代快速更替，使得年輕世代在勞動市場與決策圈的佔比下降，從而削弱了社會的整體活力與創新動力。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台灣正面臨嚴峻的少子化與高齡化問題，隨著出生率下降，年輕勞動力逐漸減少，導致整體勞動力供給不足，進而影響社會經濟結構。

1. 人口結構變化²：(1)截至 2023 年底，台灣總人口為 23,420,442 人。(2)15 至 64 歲的工作年齡人口為 16,330,044 人，占總人口的 69.73%，此比例已跌破 70%，回到 1998 年的水平。(3)65 歲以上人口達到 4,296,985 人，占總人口的 18.35%。(4)0 至 14 歲人口為 2,793,413 人，占總人口的 11.93%。
2. 扶養比趨勢³：(1)截至 2020 年，台灣的「扶幼比」（0 至 14 歲人口占 15 至 64 歲人口的比例）降至 17.63%，創歷史新低。(2)同時，「扶老比」（65 歲以上人口占 15 至 64 歲人口的比例）上升至 22.53%，創新高。(3)這意味著每 100 名工作年齡人口需扶養約 40 名老年和幼年人口，扶養負擔持續加重。

(二) 經濟面：

於普遍薪資不高，物價不減反增，高齡化社會更使青壯年負擔加重，況且養育子女花費甚鉅，教育費用不低，種種因素促使大家生育意願降低，部分女性選擇不生，另一部分則選擇先拚事業待經濟能力允許時才考慮生育，而後可能遇到之問題，例如：晚婚夫妻，年齡問題可能影響子宮、卵巢、卵子健康以及精子強壯度及活動度，甚而使胎兒染色體異常風險增加。其次，為求生活穩定，上班族普遍需要為經濟擔憂，不斷追求高薪工作或維持

² 中華民國內政部，113 年第 44 週內政統計通報，112 年底我國 65 歲人口（一般退休年齡人口）近 10 年均呈增勢，https://www.moi.gov.tw/News_Content.aspx?n=9&s=322559，(最後瀏覽日:2025/09/30)

³ 自由時報，高齡少子化扶養負擔加重 100 個工作人口得養 40 老幼，<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435947>，(最後瀏覽日:2025/09/30)

工作穩定，除了工作內容以外尚需要額外花時間提升自身能力，生活中充斥著高度壓力的情況下，加劇影響身心靈健康，社會大眾普遍只想先把自己過好，此情形更是造成生育率下降之一大主因。

(三) 小結：前述提及之問題是台灣社會普遍出現之現象，從社會及經濟層面因素交互影響下，許多男、女性由於高度壓力造成生育能力減損，仍有多數人需仰賴人工生殖技術才得以順利孕育強壯、健康之胚胎。

二、比較外國現行代理孕母法律制度與我國修法草案之內容差異與制度設計，從中分析並提出我國修法草案之修改建議。

「代孕」一詞源自於拉丁文「Subrogare」(替代)，意為「被指定代替某人行事」。它指的是替代者，尤指代表他人擔任特定角色的人，因此代孕母親指的是懷孕並生育孩子的婦女，意圖將孩子交予另一個人或夫婦(通常被稱為“預期”或“委託”或“意定”父母。)

代孕是一種重要的生育治療方法，其中體外受精(IVF)的出現使沒有子宮、因子宮異常而無法懷孕、患有嚴重健康問題或其他妊娠禁忌症的婦女能夠成為母親，其方法是使用自己或捐贈者創造的胚胎，並將其轉移到代孕母親的子宮中。該技術可幫助同性伴侶和單身人士能夠透過使用自己的生殖細胞和捐贈的生殖細胞來創造胚胎成為父母。

代孕分為兩種⁴：傳統代孕和妊娠代孕。

a.傳統代孕(基因代孕/部分代孕/直接代孕)：是指孕母親透過人工授精的方式，藉由預期父親的精子，使其與預期父親共同成為遺傳父母。

b.妊娠代孕(宿主代孕/完全代孕)：是指將預期父母或捐贈的卵子或精子中的胚胎移植到代孕母親子宮。在妊娠代孕中，懷有孩子的女性與孩子沒有任何遺傳關聯。

代孕之背後因素可分為商業性或是利他性，這取決於代孕者是否因懷孕而獲得經濟報酬。如果代孕者因代孕安排而獲得金錢，則被視為商業性的；若代孕者除了報銷醫療費和其他與懷孕相關的費用以及保險費外沒有獲得任何報酬，則被視為利他性的。

⁴ J Hum Reprod Sci, 2018 Jul-Sep;11(3):212-218

而代孕的態樣之一是子宮缺失。原因可能是苗勒氏管發育不全(簡稱：MRKH 症候群)⁵、因子宮頸癌或子宮內膜癌等婦科疾病而進行子宮切除手術。除此之外，也可能因為嚴重的結構異常，如小單角子宮、T 型子宮或多發性子宮肌瘤，造成生育治療失敗，上述內容均包含在代孕的態樣中。

另外，患有嚴重疾病（心臟病或腎臟病）而禁忌妊娠的婦女也是代孕態樣的一種。對於反覆流產和反覆植入失敗的患者，在所有可能的懷孕方法都已用盡的情況下，代孕也可被視為最後的治療手段。同性伴侶或單身男性因生物學原因無法懷孕或生育，也可能需要代孕。然而，社會發展至今已形成多元樣貌，除了以上提及的生理因素無法或不適合妊娠的女性、同性伴侶及單身男性外，在許多得使用代理孕母制度的行為人適用範圍資料中，沒有看見「單身女性」被列入得使用之行為人範圍，此種劃分方式將「單身女性」單獨置於適用範圍外，某種程度上是否違反平等權概念？

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項原則保障人民在法律上的實質平等。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權利，進而確保國家不能恣意差別對待人民。

在亞洲文化背景下，女性於職場上常面臨諸多挑戰。從多方角度中本文探討女性生育這部分，對於妊娠過程漫長，可能引發身體不適或導致工作中斷，後續還須面對產後需花費一定時間進行身心修復，使女性在職場保障與升遷制度上受到重重限制。

近年來，隨著現代社會日益強調性別平權，女性在各專業領域展現卓越能力並積極創造自身價值。在此環境下，部分女性在既期望擁有子女，又想擁有穩定工作中尋求平衡。而隨著人工生殖技術的迅速發展，健康單身女性對代孕途徑的需求日益顯著，部分國家與地區已進行法律改革，允許單身人士不分性別委託代理孕母生育子女，例如美國加州及加拿大。端看各地代孕制度規範有所差異，可能區分為商業型或利他型，惟普遍將單身男女納入申請對象，反映出在制度設計及法制更迭過程中，性別平等已成為國際共識。

⁵ 許維邦、蕭培靜、周思源、楊日昇、許維堅，苗勒氏管不發育：一病例報告並描述全人照護，台灣家醫誌 2005 Vol.15 No.3，頁 185，94 年 3 月 30 日

在自由的選擇下，代孕制度的開放引發諸多法律、倫理與社會爭議，包括親權認定、代孕契約履行、代孕母親權益保障及子女權益等議題。這些爭議中，可從三個主要角色來探討其所面臨的挑戰：

第一，委託父母（包括單身人士及夫妻）需面對代孕生殖之子女親權歸屬、代孕契約履行及可能的法律訴訟風險。

第二，代孕母親會涉及身體自主權、健康風險、報酬及法律保障等問題，尤其在契約爭議或代孕母親意願改變時更易產生糾紛。

第三，子女則可能面臨身份認定、法律保障以及知情權與身分認同等倫理議題，不同區域對其權益保障的規範差異亦可能影響其生活與法律地位。

不同國家與地區在面對上述爭議時，採取了各種制度安排與法律規範，例如透過修法、制定專法或建立糾紛解決機制加以因應。本文將比較台灣代理孕母相關修法草案與國外成熟法制，分析各地制度設計的差異、借鏡之處及可改進之處，並聚焦三類角色在法律、倫理與社會層面所面臨的挑戰，以期提供我國制度建構與政策制定之參考。

（一）委託父母（包括單身人士及夫妻）：

在代孕制度的運作過程中，委託父母作為核心角色之一，往往面臨最直接且複雜的法律風險與權益爭議。從委託父母角度切入，其主要關切議題在於代孕生殖子女的親權歸屬能否獲得法律保障以及代孕契約在履行過程中是否具有效力與可執行性。若代理孕母於懷孕或分娩後拒絕交付子女，或委託父母因各種原因欲解除契約，皆可能導致親權認定及契約效力之訴訟爭議。此外，不同國家在法律設計上對於親子關係的認定方式、契約效力的承認與否，以及跨國代孕情境下的國際私法問題，亦進一步加深了委託父母所需承擔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因此，委託父母對親權與契約安定性的需求，成為代孕制度設計中無可迴避的核心課題。

綜觀臺灣人工生殖之修法草案多以「保障子女最佳利益」為核心，對於委託父母之親權承認採取較為嚴謹的條件設計。相較之下，美國部分州，如加州則強調代孕契約之效力，透過法院預先判決（pre-birth order）直接確認委託父母的親權，以減少爭議發生。各地制度在平衡「委託父母權益」與「代孕母及子女保障」上採取不同模式，台灣未來制度設計可藉由比較與借鏡，進一步檢討如何在親權認定與契約安定性間取得適當平衡。

代孕契約履行過程中是否具有效力與可執行性？在美國加州最高法院判決 *Johnson v. Calvert*⁶ 中針對此種契約爭議有作認定，並得出意圖原則，有利於日後雷同爭議發生時之處理。

1. 本件案件事實：

為卡爾弗特夫婦（原告）在克里斯皮娜（原告）的子宮被切除後無法生育，因此他們選擇代孕。由於克里斯皮娜（原告）的卵巢仍然可以產生卵子，原告與約翰遜（被告）簽訂了一份代孕契約，契約規定將由馬克（原告）的精子和克里斯皮娜（原告）的卵子培育的胚胎植入被告體內，在契約中被告放棄了對孩子的所有父母權利，並同意分期付款。被告後來以要求原告支付契約餘款作為釋放孩子的條件。原告提起訴訟，尋求法院宣告他們是未出生孩子的合法父母。1990 年 9 月 19 日孩子出生後，被告被授予臨時探視權，儘管血液檢測結果排除了被告作為孩子母親的權利。1990 年 10 月初審法院開始審理，雙方在契約中有約定馬克和克里斯皮娜是安娜所生孩子的遺傳父母，初審法院判決馬克和克里斯皮娜勝訴，並終止了被告的探視權。上訴法院維持原判，被告提起上訴。

2. 爭點：

- (1) 在代理孕母狀況下（胚胎非由孕母基因所生、孕母僅作為代孕承載者），在加州法下如何被認定為嬰兒的生母抑或是意定母親？
- (2) 若法院認定意定母親（即提供卵子者）為生母，是否侵犯孕母的憲法權利，如生育權、母性權益等？
- (3) 該代理孕母契約中有關孕母放棄親權的條款是否違反加州公共政策或無效？法院是否應拒絕承認此類契約？

3. 法院見解：

在在妊娠代孕情境下，依《統一親子法》（UPA），女性得以生育或遺傳關係主張母性。於本案中，代理孕母安娜與遺傳母親克里斯皮娜均具備相應資格，然 UPA 雖將「生母」限定為單一對象，卻未設明確判準，致使該法規無法解決雙方衝突，法院認為，仍須調查當事人雙方訂立的代孕契

⁶ *Johnson v. Calvert*, 5 Cal. 4th 84

約，探尋雙方真正意圖。

卡爾弗特夫婦以明確意圖促成體外受精，若無其行動，孩子即不會存在；安娜僅依契約協助完成妊娠。克里斯皮娜自始即打算成為母親，而安娜若於著床前表明欲主張母性，亦不會受託懷孕。故其事後改變立場，不足動搖克里斯皮娜為親生母親之認定。

4. 小結：

儘管該法案承認基因血緣和生育都是建立母子關係的手段，但當這兩種手段在同一位女性身上不一致時，意圖生育孩子的女性，即意圖促成孩子出生並將孩子視為自己的孩子撫養的女性，根據加州法律，須根據協議與意圖裁定親權，而非僅依基因或生育。此判決使加州最高法院確立「意圖原則」並將此種原則概念用於家庭法案之條文修法，加州家庭法案第 7962 條 (e)規定中意定父母 (intended parents) 可在代理孕母懷孕前或懷孕期間向法院申請判決確立親權⁷，提高了妊娠代孕輔助生殖協議履行的有效力與可執行性。

5. 比較美國與台灣法制：另外在加州家庭法案第 7962 條 (b)⁸中規範到在簽署妊娠代孕的書面輔助生殖協議前，代孕母親和預期父母應分別選擇獨立的執業律師代表，此條規定之立法目的係為保障各方權益，代孕母與預期父母之間存在潛在的利益衝突，例如親權、代孕報酬、契約條件、醫療決策權等，並且在在代孕協議中，委託父母可能在經濟或情感上對代孕母施加壓力，要求雙方各自聘請律師，可確保每一方都能獲得獨立法律建議，不會因資訊不對稱或法律知識不足而簽署不利契約。臺灣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中代孕篇章中針對代孕契約之保障措施規定在本法第 18 條之 3，委託配偶委託代孕者代孕前，與擬代孕者應先經前條之專業評估與檢查後，再簽訂代孕契約，代孕契約應依公證法公證之，並送主管機關備查。其中僅提代孕契約須以公證方式為之，並未有其他配套

⁷ California Code, Family Code - FAM § 7962 (e)

⁸ 同前註 7，FAM § 7962 (b)

措施。惟臺灣的公證制度主要是保全與證明手段，確認法律行為的真實性、合法性與存在性，並不負責審查契約條款的公平性，若契約條款不公平，仍可能導致爭議。若以臺灣現有些法草案來看，人工生殖法基於保護代理孕母之目的欲增修篇章，條文中代孕契約僅須過「公證程序」對於代理孕母的保護力道不夠。

(5.1) 彙整說明：

我認為臺灣法律設計可以引進加州法案規定之內容，代孕契約雙方應分別選擇獨立的執業律師，條約內容經由律師把關，並且請律師商討協議內容，能降低代孕者被契約文字剝削的風險。法院日後處理契約爭議時，更易認定協議是在充分知情與自願的情況下簽訂，降低協議被挑戰為無效或可撤銷的可能，如此才能有效地減少紛爭。

(二) 代孕母親會涉及身體自主權、健康風險、報酬及法律保障等問題：

以發生於 2012 至 2013 年間美國康乃狄克州的 *Crystal Kelley* 案引發的代理孕母合約、墮胎權、以及孩子監護權的爭議來做說明。

1. 本件案件事實：

代理孕母 *Crystal Kelley* 簽署了代理孕母合約，同意為委託父母（美國稱意定父母，*Intended Parents*）懷孕生子，費用為 \$22,000 美元。然而其中一名胎兒有嚴重的健康問題，包括唇裂、顎裂、腦部囊腫和嚴重的心臟缺陷，醫生判斷孩子存活機率低，且可能有嚴重的殘疾。委託父母依據代孕契約內之條款，要求其進行減胎手術。*Kelley* 拒絕了該要求，並搬到「代孕契約無效」的密西根州生產，最終由其他收養家庭接手照顧。

2. 爭點：

代理孕母合約中「終止妊娠條款」的強制執行性：

核心爭議在於一份私人契約（代理孕母合約）是否能夠強制一位女性放棄其憲法所保障的身體自主權（*Right to Bodily Autonomy*），特別是決定是否墮胎的權利。

(1.1) 在國際學術研究中，常以墮胎權（*abortion rights*）的討論作為核心概念，並延伸至生殖正義（*reproductive*

justice) 等兼顧社會正義的論述框架。法律實務上，墮胎權辯論主要圍繞於憲法層級的保障與否，例如美國最高法院歷年的重要判決 *Roe v. Wade* (1973)、*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1992)，以及 *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均是相關學術文獻通常引用的核心案例，用以闡釋女性墮胎權在憲法層次上的承認與限縮歷程，並反映出不同時期社會價值觀與司法解釋對於身體自主權、隱私權及國家利益之間的動態平衡。

在 *Roe v. Wade* 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審查德州全面禁止墮胎的法規是否合憲。法院否定女性享有「在任何時間、基於任何理由終止妊娠」的絕對權利，但同時明確指出憲法所保障的隱私權足以涵蓋女性是否終止妊娠的決定。基於此，法院建立「三期架構」：1. 妊娠初期，國家不得干預；2. 第二期國家可基於孕婦健康進行合理規範；3. 第三期則可基於保護潛在生命的重大利益禁止墮胎，惟須為維護孕婦生命或健康保留例外。此一見解不僅使「妊娠初期的墮胎權」獲憲法保障，更奠定了後續美國生殖自主與憲法法理發展的基礎。

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505 U.S. 833 (1992)

法院重申女性選擇墮胎的憲法保障，但放棄了 *Roe* 的「三期架構」，改以「不當負擔」(undue burden) 標準審查州法規範。即若州法在胎兒具可存活性前，對女性選擇墮胎施加實質障礙，即屬違憲。本案一方面維持了墮胎權的核心保障，另一方面也擴張各州可透過程序性或醫療規範限制墮胎的空間，形成較具彈性的司法標準。

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597 U.S. ____ (2022)

最高法院推翻 *Roe* 與 *Casey* 的結論，明確宣示憲法並未賦予墮胎權，墮胎之規範應回歸各州立法決定。多數意見認為，墮胎權並非深植於美國歷史與傳統之「基本權利」，因此不應受第十四修正案實質正當程序所保障。此判決徹底改變近五十年來的生殖自主法理，使各州得以自由制定墮胎限制或禁止法律。

(1-2)Brittney Kern 學者認為⁹，在代孕契約中，任何試圖剝奪女性對自身身體決定權的條款，尤其是墮胎權，都應受到法律限制。州的核心目標是保障代孕母親的身體自主權，避免她們在面對緊急醫療或個人選擇時陷入無法自主判斷的境地。完全禁止代孕契約雖可達成此目標，但過於廣泛；要求代孕母親自行聘請律師雖可保護權利，但可能增加個人負擔。相對而言，針對契約中剝奪女性自主權的條款設置明確限制，是最合理且平衡的做法。這種規範既維護女性對自身身體的自主決定權，也兼顧私人契約自由與公共利益，充分體現法律對女性身體自主權的尊重與保護。

(1-3) 臺灣《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在代孕者身體自主權保障上的制度優勢：

我國《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在處理代孕契約中「終止妊娠條款」的強制執行性爭議時，展現高度的制度優勢，其保障的完善度超越了美國目前法律實務的破碎與不確定性。

我國的制度更勝一籌的關鍵在於採取「法定授權」的保障模式，有效排除私人契約對基本人權的侵害。

外國法理在 *Dobbs* 案後，將墮胎權的決定權下放各州，導致代孕者身體自主權的保障陷入極大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代孕合約中的終止妊娠條款是否有效，完全取決於代孕行為發生地的州法，這不僅可能迫使代孕者進行法律套利（即跨州尋求有利法律），也讓法律風險與情感壓力落在個體身上。

相對地，臺灣的修法草案提供了清晰且具有強制力的法定保障：

- i. 直接的法定保障優越性：草案在法律條文中直接確立代孕者享有「懷孕期間對身體健康相關事項之身體自主權」（第 18-4 條第 2 款），並進一步明確規定

⁹ Brittney Kern, "YOU ARE OBLIGATED TO TERMINATE THIS PREGNANCY IMMEDIATELY":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OF A SURROGATE TO ABORT HER PREGNANCY "YOU ARE OBLIGATED TO TERMINATE THIS PREGNANCY IMMEDIATELY":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OF A SURROGATE TO ABORT HER PREGNANCY, December 10, 2013

代孕者有權在符合《優生保健法》所列事由¹⁰時「得施行人工流產」(第 18-10 條)。這將代孕者的終止妊娠決定權視為一項不受私人契約約束的法定基本權利，將契約自由嚴格置於人權保障的界線之內。

- ii. 避免法律真空與不穩定性：此種中央法規直接授權的模式，使得代孕者的權利不受契約條款影響，也不受地方立法（如美國各州立法）的政治立場波動所衝擊。它提供了一個穩定且可預測的法律環境，有效地避免了因法律真空或州際法律衝突而產生的實務困境，從而提供給代孕者更具強制性與明確性的保障，使其無需擔憂因簽訂合約而喪失其對自身身體的決定權。

(1-4)小結：在代孕法制化的國際爭議中，核心衝突在於私人契約自由能否凌駕於代孕者的身體自主權之上。外國法理將墮胎權的保障權限回歸各州，使得代孕合約中「終止妊娠條款」的效力陷入不穩定的狀態，造成代孕者權益隨地區和政治立場變動的系統性風險。我認為我國《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則展現出制度上的顯著優勢，它有效地採納了國際學術界倡導的解決方案，即以法律對契約中的人權侵害設定明確界線。臺灣法案並非依賴不確定的憲法原則，而是選擇了直接且具強制力的「法定授權」模式。這種中央法規直接賦予人權、並排除契約干預的模式，使得代孕者的權利保障穩定性高、明確性強，避免了外國法制中因法律不確定或法律套利所產生的實務困境。因此，臺灣的立法設計為代孕法制建立了一套更具人權基礎和穩定性的保障框架，超越了目前外國法理所面臨的結構性缺陷。

(三) 子女則可能面臨身份認定、法律保障

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看臺灣代孕法制與國際接軌的價值核心。在代理孕母的法律與倫理論述中，「兒童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原則無疑是臺灣學界與實務評估制度的核心。臺灣直接承襲《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

¹⁰ 《優生保健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體或精神健康者；第六款，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

第三條所規範的精神，即「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兒童之最佳利益應為首要考量」(CRC, Art. 3(1))¹¹，作為制度設計的基石。此舉目的在於避免將代孕子女視為契約標的或交易工具，從根本上保障其身心發展、穩定成長環境與法律權益。

在國際實務上，臺灣對此原則的重視與趨勢完全一致。美國的加州、紐約以及英國的法律制度，皆將兒童最佳利益作為處理代孕契約親權爭議的最終裁判依據。具體而言，法院在面對代孕母親與委託父母間的親權衝突時，會優先評估子女的生活穩定性、心理與身體安全等現實福祉，而非僅依據契約條款來決定親權之歸屬。

綜觀而言，臺灣在代理孕母議題中對兒童最佳利益的重視，已與國際趨勢高度接軌。透過借用 CRC 的規範理念，臺灣的制度設計不僅與美國及英國等國的判例實務保持一致，更為未來制定明確法律規範提供了穩固的價值基礎，確保子女的權益能夠優先於成人意願或商業契約的考量，體現了法律制度對兒童福祉的最高尊重。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代理孕母」作為核心關鍵字進行資料蒐集，研究範圍涵蓋台灣與外國學術文獻、官方統計資料、網路公開資料及現行法律規定。整體研究方法分為以下幾類：

1. 文獻分析法：

蒐集並整理台灣與外國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並參考國際人權文件（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與各國官方資料。透過歸納與分析，觀察代理孕母制度在實際運作中可能面臨的法律問題，並探討應有的規範方向。

2. 比較法研究：

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國家，如美國加州、紐約及英國，與台灣《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進行比較。重點檢視親權歸屬、代孕契約效力、代理孕母身體自主權及子女最佳利益保障等面向之異同，藉此發現可供台灣制度建構之借鏡。由於台灣屬於繼受法系國家，法律制度深受外國法系影響，故比較法的運用對我國修法設計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¹¹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rt. 3(1), 1989.

3. 個案研究法：

透過分析具代表性的案例，如美國 *Johnson v. Calvert* 與 *Crystal Kelley* 案，觀察法院對於代孕契約效力與親權認定的見解，並與台灣草案規範對照，藉以檢視可能的爭點及法律因應方式。

4. 規範分析法：

以憲法平等原則、身體自主權及兒童最佳利益為核心，檢視台灣修法草案的制度設計是否兼顧多元家庭需求與人權保障。此部分強調以規範層次之分析，補足比較法與案例研究未能涵蓋的價值層面。

綜合以上方法，本研究結合文獻整理、跨國制度比較、案例探討與規範分析，旨在提出具體且具可行性的制度建議，為台灣未來代理孕母制度之立法方向提供參考。

肆、問題討論與結論

綜合全文分析，本文首先從經濟與社會層面指出，台灣面臨少子化、高齡化、晚婚及不婚等趨勢，衍生對人工生殖及代理孕母制度的需求。無論是異性不孕夫妻、同性伴侶，抑或因生理或社會因素無法自行孕育子女者，皆可能透過代理孕母制度實現家庭與生育之期待。此一需求反映出台灣社會結構變遷所帶來的挑戰與迫切性。

其次，本文透過比較法檢視美國加州、紐約及英國等地的制度，並與台灣修法草案進行對照，發現我國制度在親權認定、契約效力與代理孕母權益保障等面向，仍有精進空間。尤其在子女最佳利益、代孕母親之身體自主權，以及契約安定性之間的平衡，台灣可借鏡國外立法經驗，並透過更完善的配套措施加以補強。

總而言之，代理孕母制度不僅涉及個人權益與家庭期待，更觸及社會人口結構與國家政策走向。本文認為，台灣未來立法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核心，同時兼顧性別平等與人權保障，並在制度設計上引入更周延的契約審查與權益保護機制。唯有如此，方能在回應社會現實需求的同時，建立一套符合國際趨勢且具人權基礎的代理孕母法律制度。

伍、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1.許維邦、蕭培靜、周思源、楊日昇、許維堅，苗勒氏管不發育：一病例報告並描述全人照護，台灣家醫誌 2005 Vol.15 No.3，頁 185，94 年 3 月 30 日
- 2.自由時報，晚婚！不婚！ 女性有偶率 僅剩 48.37%，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633656>，(最後瀏覽日：2025 年 09 月 30 日)
- 3.中華民國內政部，113 年第 44 週內政統計通報，112 年底我國 65 歲人口（一般退休年齡人口）近 10 年均呈增勢，
https://www.moi.gov.tw/News_Content.aspx?n=9&s=322559，(最後瀏覽日：2025 年 09 月 30 日)
- 4.自由時報，高齡少子化扶養負擔加重 100 個工作人口得養 40 老幼，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435947>，(最後瀏覽日：2025 年 09 月 30 日)

英文文獻

- 1.J Hum Reprod Sci，2018 Jul-Sep;11(3):212–218
- 2.Johnson v. Calvert, 5 Cal. 4th 84
- 3.California Code, Family Code - FAM § 7962 (e)
- 4.*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rt. 3(1), 1989.*
- 5.Brittney Kern, “*YOU ARE OBLIGATED TO TERMINATE THIS PREGNANCY IMMEDIATELY*”: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OF A SURROGATE TO ABORT HER PREGNANCY“*YOU ARE OBLIGATED TO TERMINATE THIS PREGNANCY IMMEDIATELY*”: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OF A SURROGATE TO ABORT HER PREGNANCY, December 10, 2013